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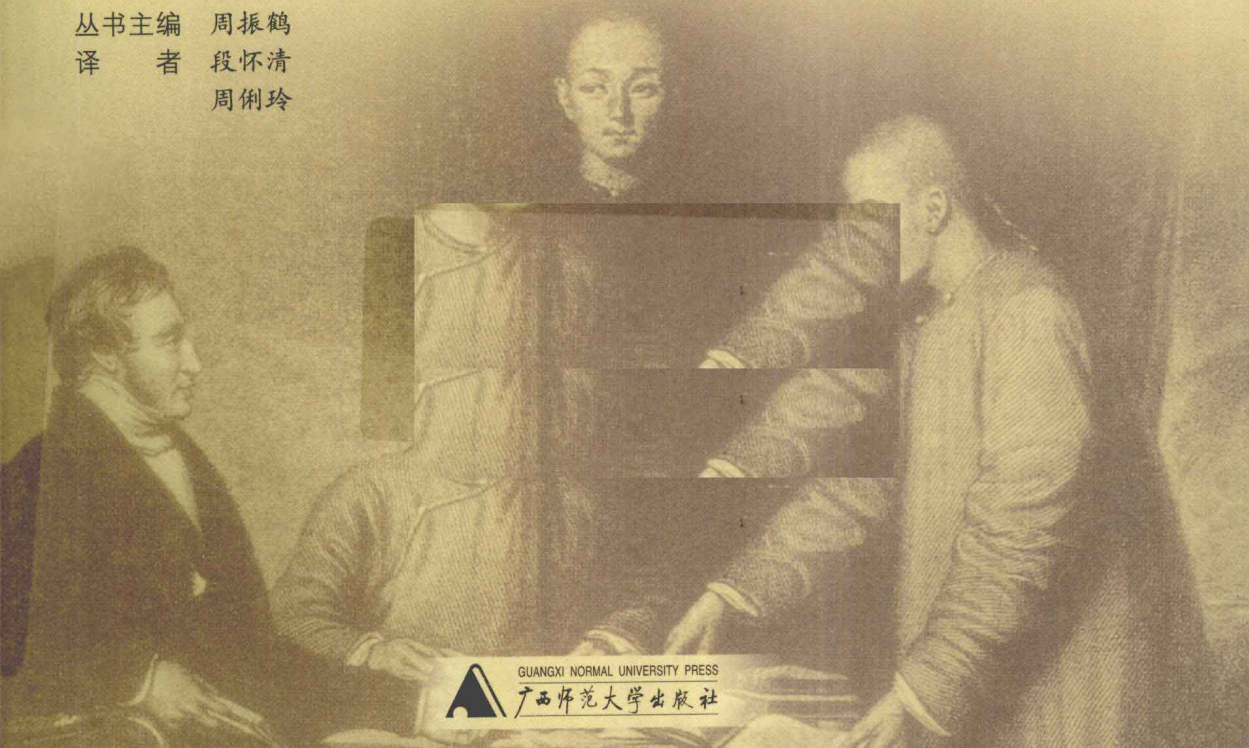


朝覲东方：理雅各评传

[美] 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 著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丛书主编 周振鹤
译者 段怀清
周俐玲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吉瑞德 (Norman J. Girardot) 著



朝覲东方：理雅各评传

段怀清 周俐玲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29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 / （美）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
著；段怀清，周俐玲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 / 周振鹤主编）
ISBN 978-7-5495-0241-7

I. 朝… II. ①吉…②段…③周… III. 理雅各, J.
(1815~1897) —评传 IV. 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228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42 字数：631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册 定价：7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

周振鹤

传记就是历史。中国的廿四部正史,全部是纪传体体裁,大致由本纪、列传、表、志四类不同形式的文字组成,其中列传主要就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占了所有正史里的最大分量。本纪则是帝王的活动记录,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传记。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说历史主要是由传记组成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宰,所以人的传记自然就是历史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西方的情况与之相类似,用历史学家 Heinrich Simon 的话说,传记是最好的一种历史。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袒露在我们面前,那么他所思想和他所做的一切,就给我们一个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的较好的领悟,比其时所有总的记录可能给我们的还多。因此重视传记就是重视历史,阅读传记也是阅读历史。这就是出版这套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在学术上的一般意义。

这套丛书还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士,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他们在中国登堂入室,不仅影响一般人的普通生活,甚至还参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干预了



中国的外交活动。其中有不少人或者留下重要著作,或者介绍中国文化于西方,或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于中国。有的甚至成了汉学研究的先驱或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虽然传教是他们的最重要使命,但其实有的传教士在这方面完全乏善可陈。例如德国的传教士卫礼贤就曾经说过,他在中国从未成功劝导过一人入教。所以无疑地,通过阅读传教士的传记或与传记相关的资料,我们又无异于在加深对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当然,传记并不总是全部可靠的。因为写传记的人与传主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传记的可信性。与典章制度的记载不一样,历史上这方面事实基本上是秉笔直书的,但人物传记不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在中国都是儒家的教导,在外国也未必不如此。加上私人之间的恩怨或利害关系,就使得传记会有不实的成分。同时传记也不好写。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叙述事实以外,还要对传主有所评价。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对于大部分的历史人物很难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评价,甚至是最公认的雄才大略的爱国者或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历史人物的所谓定评还可能随时被推翻,而作翻案文章也始终是最有卖点的工作甚至是特别的成就。而如果这些传记牵涉到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

基督教入华有过四次间断的过程。其中后两次,即晚明至清前期天主教传教士,以及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更为重要。直到1949年以前,在华的外国人中,仍以商人、外交官与传教士三种人为主,其中传教士的数量最大,如果倒退到晚明清初,绝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传教士。无论明清之际或晚清,这些传教士在中西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甚至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所以很自然地,在汉学领域里打先锋的都是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如此。传教士的第一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贡献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东西,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于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就成为传教的媒介。为了传教他们还必须学习甚至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他们也由此理解与研究了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丰富博大的文化,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时他们将这一文化的详情(有时不一定是精髓)以各种方式传播到欧洲去。当时的传教士研究中国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其有何实用价值。当然他们也有所图,那就是在欧洲文化出现危机时,试图以中国文化来济欧洲文化之穷。虽然这只是一种愿望,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课题。

当法国在1815年正式建立起汉学讲座,标志欧洲汉学研究的纯粹学术化,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变成一门学科的时候,其实是传教士奠基了两百多年中国研究以后的必然结果。同样英美等国汉学的建立,也是新教传教士筚路



蓝缕的结晶。这些传教士不但是开路先锋,而且本身具有很好的素养与研究成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传教士的功绩与影响。除了学术方面,清初的传教士还影响到中国的宫廷生活甚至皇帝的某些决策,在晚清则甚至干预到中国列强的关系,有的传教士的确在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应该得到很好的清理。而传记的写作与翻译就是这种清理工作的具体体现。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学术上对传教士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传教士都被视为文化侵略者,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大多是在鸦片战争后偕枪炮俱来,除了文化侵略以外,还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凶。近些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进展,但又出现另一种倾向,似乎所有传教士都完美无缺,都是中外关系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实际上,这样两种倾向都是缺乏历史理性,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为了正确地认识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也就是将四百年来的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空论,而其中最直接具体的莫过于传教士传记的撰写,将每个传教士的言行完整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工作西方学者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因为他们有资料方面的优胜条件。虽然西方学者的这些传记未必尽善尽美,但在我们未曾有自己撰述的新传记以取代它们时,我们不妨先将这些传记翻译过来,以作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实际上,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主要传记资料都在西方,所以即使我们有意重写这些传教士的传记,我们也不得不大量依靠西方的文献资料。

对于晚明清初天主教士的传记已经有人进行过很好的研究,有些已经翻译过来。而对于新教传教士,因为禁忌较多,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即使早有传记行世的,也始终没有人进行翻译。例如作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他的自传性质的《花甲忆记》,就始终没有全译本。对于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虽有不只一种传记译本,但对其夫人所编辑的保持原始资料较丰富的《马礼逊回忆录》以及《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也始终无人译出。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将尽可能原始的材料翻译给那些没有太多时间去找原著,或读原著比较费时费事的读者。选取的原则首先是以本人的回忆录或书信集为主,其次是他人所写的传记。传记里头又以作者为传主亲近者为先,其次才是专家所写的学术或思想评传。目的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先把比较原始的资料呈现给大家,而暂不作任何评论。如果要说的话,也是由读者去做,译者与主编者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任何高明于读者之处。这就是编辑这套丛书的



宗旨。而且这样做对历史研究还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因为越是原始的材料往往越能够体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本丛书中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就比较直接地暴露出了卫三畏的一些殖民者的观点与行为,其中对中国人的蔑视、提倡侵略中国的必要,都是通过他自己的书信表现出来的,让我们更能充分认识其人的全貌。也许今天的学者为其写传记,担心触怒中国人民的情感,倒可能删去一些内容,这反而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尽量选取原始的传记资料的另一个原因。相信读者是不会以为译者、主编者与出版社同意或赞赏传记中所呈现的传教士的错误观点与行为的。

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原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所幸这一丛书的头三本,即《花甲忆记》、《马礼逊回忆录》与《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都有很好的译者,他们不但英文功底深厚,而且对所译传记的传主都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过有关的专门的论著。在译作如林的今天,读者一定会对他们的翻译水平作出正确的评价。

翻译之道

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 美国理海大学)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15:23, 理雅各译文

对我来说，能够为我这部篇幅颇长的学术著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翻译：理雅各的东方朝圣之旅》(*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的中文版撰写一篇简短的序文，实乃一种殊荣。我要至为感谢段怀清教授的是，我这部论述“中国经典”在19世纪的英国被翻译阐释的历史，以及通过苏格兰传教士—翻译家理雅各的眼睛所观察到的19世纪“人文科学”之出现的著作，如今被翻译成了21世纪的中文。毕竟，翻译——存留于各种形式的人际理解与交流之中——亦恰似“道”。在语言文化永不停歇的有机流动与翻译改变中，它依然保持着活力。在不同文本与它们的时代之产物之间来回移动，但它依然维持着本原。也因此，我感到衷心喜悦的是，我的著作，将看到它在中国的新的语言生命。我的著作的这种回归转译也似乎格外适宜，而且它也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可能有各种形式的误解偏见，翻译本身有时还是能够实现某些洞见和理解方面的真正相关性的。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译者的道德心和翻译技巧。在此方面，译者应当永远努力去遵循圣人的



恕道——也就是一种对于语言与人民的真正它性的富有情感的考量关照。

去理解其他传统的努力——或者说与自己的意识和语言所不同的他者——总是一种比较行为，它根植于解决“相似”的隐喻性类似之中。19 世纪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当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对于扭曲了所有公正了解认识彼此之努力的对等权力方面。不过，人类在某些方面的类似——除了传统、种族差别和语言——却可以通过不同语言和文化形式的翻译而得以弥补。如果在彼此之间存在着实际交流的话，情况也就必定如前所述。诚然，如道家庄子所言，某些类似于“意”或者知的东西，是可以通过这种语言或者那种语言中那些最无意义和滞涩的词语而得以传递的。正如在我书中所涵盖论述的 19 世纪中，中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世纪（20 世纪——译者注）的中国，亦证明会在文化上、经济上、社会上甚至宗教上发生巨大变化，尽管在当下，压力是全球性的，而不仅止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在新千年肇始之际，基于相互尊重和包容的辛勤翻译及跨文化交流工作，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要比在 20 世纪之初更为需要适宜。勇毅勤勉的传教士—学者理雅各，与崇尚礼仪的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在他们令人尊敬的一生和使命中也实践了这样一个原则，即真正的美德，始于人类交往中知识和道德上的互动互惠。这不仅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在语言上的一种联系，而且也是中国与西方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文本上和不同时代及文化传统上的一种联系（像理雅各与孔子那样。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吉瑞德与段怀清亦如此）。如此说来，我的书中有关翻译历史的叙述，似乎也不过是讲述了一个有关误解的单方面且尚未完结的故事。不过，或许这里未曾阐明的是，这些极为相同的翻译，开启了通往翻译以及西方逐渐修正（不过总是大概）对于中国的理解之路。迄今，这一过程在本翻译中得以延续，继续开启着当代中国人睁眼审视纷争交织的 19 世纪那些中西方彼此之间最初交流过程中的理解与误解之历史。道亦然。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这部著作的中译本，能够对当代中国具有一定历史的、文化的和真实存在的意义。就历史而言，西方在中国的“使命”，大多以美国式的经济与政治的方式在延续，尽管最近福音派基督徒的激情再次重现，这种重现方式，在理雅各看来，或许并不十分奇怪。一般而言，在这个电子网络和 Google 搜索全球信息流的年代，我们发现，道家的阴阳学说仍然有效：年轻的中

国人在学习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地球扁平说”，而美国和欧洲的年轻人则在探求《维尼熊的道》中老子的神秘学说。毛泽东和猫王已成为全球性的偶像。但在文化意义的宽泛存在及人文语境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活动的最让人惊叹的颠覆逆转。所以，如果要举出这样一个颠覆逆转的事例，平心而言，那就是如今中国人在电影或视觉艺术领域中诸多富有创意领先的活动了。换言之，往往是通过中国人对西方艺术形式的适当借用，最好地把基本人类价值转译成了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能理解的视觉语言。正是使用这一方法，当代中国艺术家已经成了真正的文化译者和全球朝圣者。

在一个恐怖极端行为纷扰，以及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形式重新盲目出现的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学习像理雅各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化翻译家和朝圣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与人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很有可能超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局限性，同时又能够不至于偏颇地翻译另一种文化的真理。翻译的时候，不是按照字面意思的直译，或者以理解的意思的意译，而总是要像理雅各那样，努力通过一种“同情的理解与阐释性的实践”的更为互惠的、比较的、隐喻和象征的方法，去直接面对学习处于敌对面的宗教、经典以及学术权威。作为译者的理雅各深知：道可道，非常道。然而，一个勤奋且富怀着敬重同情之心的译者，一定会渐渐地接近语词、文本与人民的一般常识、范围、主旨或者道。此乃理雅各之信条，即与中国经典（如他所翻译的《孟子》）的智慧保持一致，著述与文化之译者才可能实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在我看来，对于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所面临的生活之相互理解学习来说，理雅各的经验，依然为一典范。

目 录

中文版序 翻译之道	001
插图目录	001
前言 联结东西方的传教士生涯:1815—1869	001
第一章 朝圣者理雅各和他的回归西方之旅:1870—1874	059
第二章 理雅各教授在牛津大学:1875—1876	111
第二章附录 理雅各:牛津的一个大人物	156
第三章 异端者理雅各:打通儒教与基督教,1877—1878	159
第四章 阐释者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找寻圣经,1879—1880	209
第五章 比较者理雅各:描述并比较中国宗教,1880—1882	244
第六章 开拓者理雅各:翻译佛教和道教经典,1886—1892	292
第七章 教育者理雅各:高扬人的完整责任,1893—1897	358
附录一:理雅各主要出版著述	406
附录二:理雅各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与课程(1876—1897)	409
注释	415



外一种 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

第一章 早年生活	489
第二章 决定终生的选择	496
第三章 在马六甲	499
第四章 香港与《中国经典》	509
第五章 在香港的生活	524
第六章 “术语问题”	538
第七章 有关中国人生活与工作的一些事件	543
第八章 太平天国的干王	554
第九章 车锦光,第一位华人殉教者	561
第十章 理雅各夫人信札摘录	574
第十一章 溯西江而上	588
第十二章 在香港的最后岁月	595
第十三章 华北之旅	610
第十四章 英格兰的最后时光	626
译名对照表	647
译后记	651

插图目录

1. 伊本内泽·理(Ebenezer Legge)	003
2. 乔治·理牧师(The Reverend George, L. L. D).	013
3. 玛丽·伊莎贝拉·理(Mary Isabella Legge)	019
4. 理雅各牧师(The Reverend James Legge, D. D).	024
5. 一座中国寺庙	026
6. “最近被引见给女王的中国青年”	033
7. 理雅各与中国学生	034
8. 理雅各博士的《中国经典》范本	037
9. 香港教团会所	045
10. 理雅各博士的《中国经典》扉页	047
11. 理雅各一家与王韬	050
12. 北京街景	077
13. 北京天坛	079
14. 艾约瑟博士(B. A., D. D)	082
15. 中国骡车	083
16. 泰山进香图, ca. 1900	085
17. 曲阜孔陵	087
18. “巨猿”(笔名)画的麦克斯·缪勒像	105
19. 麦克斯·缪勒,“一个德国人的书斋札记”	109
20. 麦克斯·缪勒的《梨俱吠陀经》(<i>Rig-Veda-Sanhita</i>)译本扉页	134
21. 牛津的“东方圣人”	141
22. 身着学术盛装的理雅各	156
23. 作为“牛津大学大师”之一的理雅各	157
24. “牛津的学术巨头聚会”	157
25. 汉娜·玛丽·理(Hannah Mary Legge)	162



26. 郭嵩焘, 大清国驻英公使	165
27. 托马斯·希尔·格林	173
28. 费尔贝恩	173
29. 麦克斯·缪勒的《东方圣典丛书》合同的封面	215
30. 理雅各一家在牛津	247
31. 理雅各与女儿和孙辈们	248
32. 理雅各在他的牛津研究室里休息	248
33. 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圣人的理雅各	293
34. 基督教教徒的碑	350
35. 理雅各的最后板书	397
36. 理雅各的中文练习本	397

前 言

联结东西方的传教士生涯:1815—1869

坐落在山谷中的一个小镇

1896年的春天,在儿女们的激励之下,理雅各坐在他在牛津大学的工作室里,着手清理那已经开始褪色的记忆,试图记录下自己那漫长而多产的一生。作为一个大家庭中的最长寿者,以及西方世界的汉学东方主义(Sinological Orientalism)的德高望重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理雅各感觉到了人生暮年的悲凉寒意,但他乐意顺从孩子们的心愿。理雅各的情绪显然受到了这样一种意识的影响,那就是他的在世时日已经屈指可数,当然他也想弄清楚自己在人生之旅中经历过的错综复杂的转折,即使不是“每一件隐秘的事情”。毫无疑问,在一生当中每一个重要的关口,理雅各都笃信自己担负着世俗的和神圣的双重责任,从而将自己的东方朝圣之旅定位为一个父亲、一个基督徒、一个传教士和一个学者的人生之旅。这一自传性的文献,以及一些来自其早年生活的其他文献,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以便于我们理解他的一生当中几个关键的转折:作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受封代理人、作为香港的一个传教



士—牧师—学者、作为牛津大学的一个汉学家—东方学家—比较学家。这些连接起来的过渡,不仅追溯出理雅各人生的动态轨迹,而且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所出现的文化、宗教以及知识变化的鳞鳞爪爪。

遗憾的是,这位 81 岁高龄的教授没能完成自己的《余生漫录》(*Notes of My Life*)。他的回忆多少有些神秘地终止于他在香港的三十年生涯的开端,这一殖民地建立于 1842 年,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后来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商业站点。但是,理雅各确实给我们勾勒出了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中产阶级”的男孩,来自苏格兰的小镇;在阿伯丁的国王学院接受教育,作为一个年轻人经历了“人生转变”;在伦敦传道会的监督之下,他决定献身于海外传教事业;作为一个 25 岁的传教士,他在富有异国情调的亚洲前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开始了最初经历等等。¹理雅各的叙述,常常与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笔下有关 19 世纪福音主义者的故事大同小异。而麦克唐纳跟理雅各一样,来自同一个苏格兰小镇,也是一个著名的独立的苏格兰人,一个非国教派。这也是有关成长的典型故事,讲的是那个来自苏格兰的地方小镇的“读书种子”,怎样在青年时代不辞风险地到英格兰和伦敦,去看一个更大的都市世界,并最终在心中找寻到正义的基督上帝。而这种人生和精神类型的确定,导致了他们与社会和宗教方面许多更传统的、有时候甚至是伪善的形式的终身抗争。²对于理雅各与麦克唐纳的故事中那些虔诚而坚定的人物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最深刻的实现,乃根植于道德法则的“对于上帝的服从”——那一“自然法则”是“写在人的心灵之中”的,对此,圣保罗(Saint Paul)、杜加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以及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曾经用不同的方式表述过。³

通往世界之途

理雅各出生于 1815 年 12 月 20 日,他是一个成功的衣料商伊本内泽·理(Ebenezer Legge, 1770—1848; 见图 1) 的四个儿子(乔治、约翰、威廉和雅各)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出生地汉德利(Huntly),是“坐落在山谷中的一个小镇”,位于苏格兰的阿伯丁,其四周石楠丛生,山上杉林遮天蔽日。小镇就静静地坐落



图 1. 伊本内泽·理 (Ebenezer Legge)

在被煤泥污染的德佛龙河与波吉尔河的交汇处。⁴理雅各的出生之年有一件尤为值得铭记之事,就是威灵顿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在滑铁卢 (Waterloo) 战役中最终战胜了拿破仑,而这一结果也奠定了大英帝国迅速称霸世界的优势地位。理雅各出生的时代,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表述的那样,见证了畸形的“现代性的诞生”——这一说法暗指日益增长的激进的、国际的以及包罗万象的“通往一切事物之途”(异国思想、文献、人造物品、艺术品、建筑、机器、宗教和文化),这一切由新的工业时代和西方世界不断增长的军事、商业和政治霸权引领导人。⁵这种可预见的文明“进步”意识,离不开不断增长的朝向世界之他性的接近或者对他性的主宰。实际上与此相关的是教育、交通、工业、技术、宗教和社会政策中的自我启蒙意识和自由进步,而这又离不开同时代的苏格兰传统,特别是由商人和专业人士组成的苏格兰中产阶级。因此,理雅各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这个家庭在 19 世纪之初的汉德利通过漂白和亚麻布贸易的快速